

“红色经典”海外传播与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

姜智芹

【摘要】作为与当代社会发展结合紧密的文学艺术类型,“红色经典”的海外传播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有着内在的关联。“红色经典”在20世纪50—70年代集中传播到欧美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建构起关于“红色经典”的知识再生产;而国外知识界特别是美国和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对红色中国的认同与赞赏起到了消解彼时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负面宣传的作用,他们对毛泽东思想的热衷与“红色经典”所反映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形成互文、互动及互鉴。新世纪以来,国外文学文化领域对我国“红色经典”改编的关注,同近年来国外经济政治领域渴望了解并热衷探讨当代中国成功发展经验的内在需求,形成某种隐在的呼应。

【关键词】红色经典;翻译传播;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毛泽东思想

【作者简介】姜智芹(1967—),女,山东单县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山东 济南 250014)。

【原文出处】《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济南),2024.2.22~35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文献整理与研究(1949—2019)”(20&ZD287)的阶段性成果。

文学记录着时代的发展,见证着社会生活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参与国家政治和经济建设的重要角色。正因为如此,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成为国际社会认知中国的一扇窗口,而国际社会对当代中国的认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二者的互动互鉴成为当下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新视点。

随着我国经济的良性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世界各国都渴望加强对中国的认知和了解,而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传播便是其中一个重要途径。当下的国际社会有着渴望了解中国社会发展模式、解码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深层次需求,这在与我国当代社会发展同频共振的文学创作中得到反映。“红色经典”的创作与再创作贯穿于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进程,堪称与我国当代社会发展结合紧密的文学现象,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因此,本文将我国“红色经典”

的海外传播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关联起来考察,在当代语境中阐释“红色经典”的世界价值,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时代氛围中观照“红色经典”的世界影响。

一、“红色经典”的翻译与出版

“红色经典”是集中心体现国家意志的文学类型,表征着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无疑会引起国外的关注与研究。“红色经典”的译介、出版、海外接受与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历了20世纪50—70年代和21世纪以来两个重要发展阶段,在传播形式上涵盖“红色经典”的文本作品、戏剧演出、影视改编、连环画创作等。鉴于国外对“红色经典”的广泛关注,本文主要讨论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为题材、创作于20世纪40—70年代并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获得新发展的“红色经典”作品。

“红色经典”的翻译出版主要有自我译介和他者

传播两个渠道。前者是国家翻译实践,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外文出版社和英法文版的《中国文学》杂志主导。新中国成立之后,一些国外友人表达了对中国新生文学的兴趣,而国内也涌现出一批反映中国人民新生活的作品,外文出版社和外文版的《中国文学》杂志恰逢其时地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同时也表明,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从一开始就不是我们在强推自己的文学文化,而是积极回应世界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需求。外文出版社在20世纪50—70年代出版了小说《保卫延安》《红旗谱》《红日》《山乡巨变》《林海雪原》《创业史》《青春之歌》,以及歌剧、京剧、芭蕾舞剧《白毛女》《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红色娘子军》《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海港》等作品的英译本^①,对于国外在冷战时期与中国交流不畅的情况下,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历程、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和社会主义初期的经济建设与社会风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就他者传播来说,20世纪70年代英语世界集中出现了四部有关“红色经典”的戏剧集,分别是《共产主义中国戏剧集》(*Modern Drama from Communist China*),收入《白毛女》(*The White-haired Girl*)、《红灯记》(*The Red Lantern*)等;《舞台上的中国:一位美国女演员在中国》(*China on Stage: An American Actres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收入《智取威虎山》(*Taking Tiger Mountain by Strategy*)、《沙家浜》(*Shachiapang*)、《红色娘子军》(*Red Detachment of Women*)、《红灯记》等;《红梨园:革命戏剧三种》(*The Red Pear Garden: Three Great Dramas of Revolutionary China*),收入《智取威虎山》等;《五部中国共产主义戏剧》(*Five Chinese Communist Plays*),收入《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等。虽然这四部戏剧集的译文主要来自《中国文学》杂志和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外译图书,但由于是外国人编选、国外出版社出版,其影响要大于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译成英文的“红色经典”作品,具体表现为这些国外出版的中国戏剧集不仅大多有英文书评发表,而且学术引用也相对多一些。^②

除了英语世界以外,苏联、日本、越南、韩国等也主动译介、传播我国的“红色经典”作品。1951年,

《白毛女》《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苏联“斯大林文学奖”。《林海雪原》《保卫延安》《山乡巨变》等在20世纪50—60年代译成俄语出版,并影响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等国对我国“红色经典”的译介。20世纪50年代在东欧出版的我国“红色经典”有很多是经由俄语转译的,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借助俄译本翻译成保加利亚语、匈牙利语、捷克语、波兰语和罗马尼亚语出版。此外,《暴风骤雨》《李家庄变迁》《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也是通过俄语译成东欧各国语言的。其中,捷克因其深厚的汉学传统和汉学人才,直接将我国的部分“红色经典”作品从中文翻译成捷克语。例如,师承捷克著名汉学家普实克(Jaroslav Prusek)的史丹妮(Danuška Heroldová-Šťovíčková)将《李有才板话》《新儿女英雄传》等从中文翻译成捷克语出版。^③

在亚洲国家中,日本比较早地主动传播我国的“红色经典”作品。1951年,饭塚朗(Iizuka Akira)翻译的《新儿女英雄传》由东京彰考书院出版;1960年,岛田政雄(Shimada Masao)等译的《青春之歌》由东京至诚堂出版;1962年,饭塚朗翻译的《林海雪原》(收入《中国现代文学选集:10—11》)由平凡社出版。1955年,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根据《白毛女》的电影版和歌剧版,改编成芭蕾舞剧《白毛女》并搬上舞台,凸显出文学艺术在民间外交中的重要作用。1972年,上海芭蕾舞团应邀赴日本访问,期间演出《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剧目,被称为中日外交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日本几乎是在同步传播我国的“红色经典”。

越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于1959年至1960年推出《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苦菜花》《山乡巨变》《三里湾》《百炼成钢》等多部“红色经典”的越南语译本。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签订文化合作协定的结果。1951年至1958年,我国先后与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朝鲜、蒙古、越南等国签订文化合作协定,以书籍交换、翻译和出版的形式推动我国“红色经典”的外译传播。

在韩国,“红色经典”则更多地在20世纪80—90年代译成韩语出版。1987年,《青春之歌》由朴在渊

(Pak Chae-yŏn)译成韩语出版;1989年,《红日》《红岩》《保卫延安》《山乡巨变》等分别由朴荣彬(Park Yeongbin)、朴云锡(Park Unseok)、李弘奎(Lee Hong-gyu)、李正宇(Lee Ujeong)译成韩语出版;1995年,《林海雪原》由金学松(Kim Haksong)译成韩语出版。同一时期翻译成韩语出版的还有一批红色文学作品,像《黎明的河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及至21世纪,韩国又翻译出版了《地球上的红飘带》《邓颖超传》《改革开放元勋画传丛书: 习仲勋画传》等。韩国对我国“红色经典”的译介之所以滞后于西方和日本,是由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语境决定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韩国大学的中文系数量激增,再加上韩国民众喜爱文学情绪高涨,带来对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的阅读需求。而90年代中韩建交形成的良好交流氛围,使得红色文学作品一直出现在韩国的中国文学译介名单上。

20世纪90年代之后一段时间,大量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红色经典”作品在我国被改编成影视剧播出,重又引起国外学者对“红色经典”的关注。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我国对红色资源、红色基因、红色传统、红色文化的强调,“红色经典”的意义在当下语境中被重新唤醒,其对于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得到彰显。在这一背景下,国外生发出对“红色经典”在改革开放时代演变的关注和在当今中国价值的关心,使得“红色经典”在世界范围内因应时代召唤而释放出更多的意义空间。

致力于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的何明星教授从当代文学外译本的世界图书馆收藏量、海外传播范围、海外学术评论和读者反馈等方面,筛选出1949年至2019年70年间对世界影响最大的10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其中排在前四位的分别是《白毛女》《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色娘子军》。^④可见,“红色经典”已是构成中国当代文学世界影响力的重要方面。时至今日,《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等依然在西方国家传播。2009年1月,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法国巴黎歌剧院上演,这也是巴黎歌剧院首次演出中国红色革命经典剧目,一位法国观众用“美丽的故事,我很喜欢”来表达自己的观剧感受。^⑤2015年,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纽约林肯中心成

功上演;同年,在维也纳的演奏也引起良好反响。2017年,该剧在澳大利亚墨尔本艺术中心演出,受到观众热烈的欢迎,西方人甚至将其和《天鹅湖》相提并论。2015年5月,电影《智取威虎山》在新西兰惠灵顿展映,引发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2022年11月,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在加拿大多伦多文化中心演出,获得巨大成功。国外在当下语境下对我国“红色经典”的关注与喜爱,将中国的历史和当下联结起来,昭示着“红色经典”跨时空的生命张力。

“红色经典”翻译出版之后,成立于1949年12月的中国国际书店首先承担起向外传播发行的重任,通过赠送、交换、西方国家共产党以及国际共运组织开办的“红色书店”等多种方式和渠道,将“红色经典”译本输送到目标语国家。赠送、交换主要借助各国的大使馆和领事馆送出,或作为礼物赠送给国外的大学图书馆,而西方的“红色书店”则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英国共产党创办的中央书店、法国共产党创办的巴黎文学社、美国共产党创办的“出版物和产品进口公司”以及英国人汤姆·罗素(Tom Russell)的柯烈茨书店、美国共产党人亨利·诺伊斯(Henry Noyes)的“美国中国书刊社”等,对我国“红色经典”的海外销售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冷战对立的国际形势下,这些机构和个人多方周旋,在困境中坚持售卖中国书报,构筑了一个包括“红色经典”在内的全球发行网,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红色中国”的先进形象。

翻译归根结底是知识的传播。最近引起国内学者热议的知识翻译学认为,翻译是“地方性知识向世界性知识的生产变迁”^⑥,是对他者的地方性知识进行创作性吸收、重构从而成为普遍性知识的过程。“红色经典”翻译成外语出版之后在海外产生了怎样的知识生产、知识迁移和知识流动,又有哪些共鸣、对话和再传播?这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问题。

二、“红色经典”的海外接受与西方左翼知识分子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

“红色经典”传播到国外之后,很快引起西方研究者的关注,并从不同方面给予评价和阐述。西方多以“共产主义小说”(communist fiction)称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当代文学创作。对于向外推介“红

色经典”的外文出版社,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阿诺德·罗博塔姆(Arnold H. Rowbotham)这样说道:“外文出版社把借助文学形式和技巧向西方世界阐释中国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任务”,《山乡巨变》“在对外宣传的面纱下,成功地、令人信服地向我们揭示了‘小人物’生活中的悲欢离合”^⑦。夏济安(T. A. Hsia)的《中国共产主义小说中的英雄和英雄崇拜》^⑧是英语世界较早研究我国“红色经典”的论文,该文从生活、艺术和意识形态三者的关系出发,以《青春之歌》《红日》为例,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文学创作中的英雄和英雄崇拜主题。夏济安认为,共产主义小说中的英雄“有着阳刚的外表,对朋友忠诚,对敌人勇猛,对弱者怀有恻隐之心,面对困难沉着冷静,无私勇敢”。^⑨《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成长是她自身血液净化的过程,是她‘无产阶级’身份自我实现的过程”。该小说的双重主题——“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寻求革命自我”和“浪漫女青年追求英雄式生活”最终合二为一:“林道静在党的怀抱里既走上了革命道路,也找到了英雄主义式的人物。”^⑩《红日》是一部表现男性气概的小说。副军长梁波的勇敢是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历练出来的”,他“以自身的‘英雄气概’赢得了女性的爱慕”^⑪,而小说中的战士无不“勇敢顽强”“一切行动听指挥”^⑫。《红日》塑造的是英雄群像,尽管有“扁平人物”之嫌,但他们都是“出色的好人”。^⑬

黄胄(Joe C. Huang)的《共产主义中国的英雄和坏人形象:作为社会生活反映的当代中国小说》^⑭是西方较早探讨我国“十七年”文学的专著。该书研究了1949—1966年出版的25部小说,其中“红色经典”作品有《红岩》《创业史》《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美国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认为:“黄胄不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共产主义小说视为文学作品,而是作为社会材料……将小说作为进入‘大众’社会生活的一个途径。”因为“作家是社会生活的缜密观察者……他们将自己看到或经历的日常生活中的大量细节融入作品当中”。^⑮国际著名比较文学学者、荷兰汉学家佛克马(D. W. Fokkema)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发展同中国社会的进步变迁联结起来考察,强调黄胄著作中对英雄人物探讨的重要性:“当

中国社会处于动荡、失序状态的时候,人民渴望超人英雄出现,救他们于水火之中。而新的秩序建立以后,超人英雄则被‘社会主义新人’所取代。”^⑯

20世纪70年代国外编选、出版的中国当代戏剧集也引起西方人的关注。德克萨斯大学的罗伊·蒂尔(Roy E. Teele)认为,《共产主义中国戏剧集》中“像《白毛女》《红灯记》这样的戏剧都是经典之作,它们的故事性很强,舞台演出效果极好”^⑰。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的康斯坦丁·董(Constantine Tung)指出:“共产主义戏剧揭示出很多真理,具有很大的真实性”,西方读者期望能从这些戏剧中窥探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方针路线”。^⑱对于《舞台上的中国:一位美国女演员在中国》,夏威夷大学的G. L.安德森(G. L. Anderson)指出:“有趣的是,西方的芭蕾舞不论在纽约还是伦敦都不是普罗大众声音的表达,但在共产主义中国,它很容易地成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戏剧形式。”“洛伊斯·惠勒·斯诺(Lois Wheeler Snow)成功地让我们看到当代中国戏剧如何对那些满怀同情、充满热情的西方人具有吸引力。”^⑲

日本对我国“红色经典”的翻译与接受是与“对日本文化状况的批判性思考紧密结合在一起”^⑳的。比如鹿地亘(Wataru Kaji)在日本战败后的20世纪50年代翻译了《暴风骤雨》,在“译者序言”里他这样阐述翻译该小说的动机:“读了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之后,我首先亲身感受到了这一点,并促使我耐心地把它介绍给日本:军部和财阀之流的所谓‘王道乐土’的阴影,事实上就象即将坍塌的一堆沙土,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更谈不上什么百年大计!”“今天必须明白,当日本重建时,一定不能再走老路。沙滩上不能建筑楼房,我们同亚洲的各民族,尤其同我们休戚相关的中国人民的关系,必须打下毫不动摇的坚固的基础。为此,作为一个警告,这部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寒而栗的真相。”^㉑可见,日本学界对我国“红色经典”的接受往往是对其自身存在问题的反躬自省。

“红色经典”在国外产生的深层影响表现为对国外作家创作立场和创作方向的改变,并由此促发新的文学思潮运动。如印度尼西亚著名作家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Pramoedya Ananta Toer)在20世纪

50—60年代中国和印尼友好关系的推动下,与中国作家密切交往,广泛阅读外文出版社和《中国文学》杂志推出的中国文学作品,最终从一名“中间派”作家成为左翼文学运动的旗手,实现了从人道主义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转变,并引领了印尼的左翼文学运动。^②

上述域外对“红色经典”的阐释、评价和接受多从社会层面着眼,关注文学作品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以此来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变化发展,和国外知识界特别是左翼人士对中国的认知形成互文。下面,我们以美国左翼和法国左翼在20世纪50—70年代对中国的认知为考察对象,将其和西方人通过“红色经典”对中国的认知进行互动观照。

在20世纪50—70年代,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积极评价和正面认识的美国左翼人士主要有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韩丁(William Howard Hinton)、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William Edward Burghardt DuBois)、罗伯特·斯卡拉皮诺(Robert A. Scalapino)、多丽·韦尔(Dolly Veale)、尼尔林夫妇(Helen and Scott Nearing)、罗伯特·威廉姆斯(Robert Williams)、休伊·纽顿(Huey P. Newton)、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菲利克斯·格林(Felix Greene)等人。他们肯定中国的革命模式和建设发展成就,赞赏毛主义新人,推动掀起一股曾风靡欧美的“毛主义热”^③及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肯定与赞叹。

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多丽·韦尔、菲利克斯·格林、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等都对中国的革命实践给予高度评价。

斯卡拉皮诺是美国知名左翼学者,中文名为“施乐伯”,是一位有名的“中国通”,曾任东亚和中国政策顾问。他在《亚洲的共产主义革命:战术、目标和成就》一书中认为,“中国共产主义是亚洲共产主义的样板”^④,并且指出中国共产党由于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而带来革命的成功,对于当时亚洲那些具有开展“民主解放”运动条件的国家,像“缅甸、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等^⑤,具有重要的借鉴

价值和指导意义。他通过实践性的考察和分析,得出“中国革命模式已经对大多数亚洲共产党领导人的思想和行动产生了巨大影响”的结论^⑥,表明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所造就的革命范式在亚洲一些国家成功地起到了示范作用,凸显出中国红色文化在亚洲的革命性、先进性和辐射性。

韦尔以自己在20世纪70年代大学生身份参加美国当时反战运动、支持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的亲身经历,得出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灯塔和根据地”^⑦的看法,表现出对毛泽东思想的高度认同。格林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墙有两面:今日中国肖像》中写道:“对于千千万万的亚洲人、拉美人和非洲人来说,北京已经成为新的麦加”^⑧,是亚非拉革命的朝圣之地。杜波依斯于1959年来华访问时写了一首《我要向中国歌唱》的诗歌,在诗篇的最后强调中国革命对于世界的重要性:“欢呼吧,中国!/江河翻滚,/日月欢歌!/山川改颜,/人群欢呼!/救世主再度从东方出现!/领导所有死去的先知——/奥西里斯、释迦牟尼、耶稣基督、穆罕穆德/埋葬他们的遗骨,珍视他们的美德;/中国将拯救世界!/中国正冉冉升起!”^⑨杜波依斯以自己的亲眼所见和亲耳所闻,向世界展现了一个改天换地的中国形象,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西方人眼中的救世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不只是在亚洲,甚至在全世界都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成为美国左翼知识分子津津乐道的成功的革命范式。这与英语世界对以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为表现对象的“红色经典”的关注,形成互动、互识和互鉴。斯诺的妻子洛伊斯·惠勒·斯诺在其《舞台上的中国:一个美国女演员在中国》中称李玉和是“中国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⑩,《青春之歌》中的卢嘉川在英国的艾华(Harriet Evans)看来是“有着英勇的骑士精神”^⑪的共产党人,他们是推动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千千万万伟大而又平凡的英雄,是中国革命模式的实践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国民素质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美国左翼在20世纪50—70年代对红色中国的经济建设、毛泽东思想锻造的社会主义新人都进行了积

极正面的评价,对于消解此一时期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国的负面宣传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建国初期,鉴于中美对峙的大环境,美国媒体以“饥饿的中国人”为主题,发表了大量充满偏见的新闻报道,甚至抛出中国行将崩溃的荒谬论调。但美国左翼并没有轻信这种宣传,而是以实地考察、具体数据分析为依据,将他们对中国的真实发现公之于世。在这里,我们结合菲利克斯·格林、埃德加·斯诺、约翰·加尔布雷斯、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鲍大可等人的相关著述略作阐述。

格林和斯诺在20世纪50—60年代多次访华,他们根据自己的在华见闻撰写的著作主要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人民的生存状态。格林于1960年访华后出版了《觉醒了的中国:美国人所不了解的国家》(*Awakened China: The Country Americans Don't Know*)、《墙有两面:今日中国肖像》(*The Wall Has Two Sides: A Portrait of China Today*)等著作,通过实地考察记录的具体数字来呈现他所看到的中国农民和工人的收入情况:“社员每人每月可挣7元至12元”^②，“工人的平均工资为每月70元”^③。斯诺根据自己在北京一家矿场的考察,在其《大河彼岸:今日红色中国》中的记录是当时中国工人的工资每月最低36元、最高120元人民币。^④索尔兹伯里和加尔布雷斯则呈现了20世纪70年代中国工人的收入状况。加尔布雷斯于70年代初期访华,在其《中国通道》中记录了北京店员的工资:平均每月“63元”^⑤;索尔兹伯里在《北京及北京以远:来自新亚洲的报道》中记载了中国一家钢厂工人的工资情况:“平均每月接近60元”^⑥。不同左翼人士对当时中国不同行业收入的记录彼此接近,因而具有较大的可信度,显示出当时中国人的收入虽然不高,但差别不大,不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更为可贵的是,这些左翼人士没有止于单纯收入数据的记录,同时还对中国当时的价格指数和购买力进行了相应考察。在格林笔下,北京街头“一分钱能喝一杯水”^⑦，“三分钱可看一场现代画展”^⑧。斯诺则将当时中美两国的价格进行对比:“一位中国大学生每年花费国家不到100美元,而一位美国大学生要花费父母2000美元。”^⑨再加上中国当时医疗免费、一些行业住房免费、零失

业率,使得此时的中国人虽然物质上比美国人清贫,但幸福指数要比同时期的美国人高。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快速发展也令美国左翼人士赞叹不已。格林强调,虽然此时中国人的收入比美国人低,但“中国工业发展的速度仍然是超乎想象的,甚至是史无前例的”^⑩,远超过当年美国的发展速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⑪。斯诺同样高度肯定了中国的发展变化:“速度惊人”“令人慨叹”。^⑫加尔布雷斯也指出中国在“快速、持续地发展”^⑬,中国的经济体系比西方一些国家的“更灵活、更具实效、更充满活力、更突出质量”^⑭。左翼人士在他们的著作中向世界披露了与美国主流媒体宣传中完全不一样的中国,展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中国人民的真实生活图景和中国社会、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

在20世纪50—70年代的美国左翼人士眼里,中国的巨大变化不仅表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且突出表现在国民素质的综合提高,即被他们称为“毛主义新人”的蓬勃向上。比如《纽约时报》的三名记者窦莫安(Tillman Durdin)、詹姆斯·赖斯顿(James Reston)、西默·托平(Seymour Topping)联合撰写的《纽约时报: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 from Red China*)第三章的标题就是“‘毛主义新人’的日常生活”(“The Everyday Life of ‘Maoist Man’”),该书向美国人报道了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见所闻,内容涵盖当时中国的工资水平、社会保障、人口生育、工业发展、北京的市政建设、乡村的赤脚医生、农业产量、工业规划、军事发展等方方面面,对于古老的中华文明焕发出的生机和活力充满了赞叹。詹姆斯·赖斯顿在和妻子乘坐火车从广州到北京的途中发现,“没有一块土地是闲置的,没有一块土地不是精耕细作的”^⑮。此一时期的中国虽然基础薄弱,但人们满怀自豪感,不仅干劲冲天,而且互助合作,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到处呈现出一派令人钦羡的生机勃勃的景象。赖斯顿禁不住慨叹道,这“令美国人极度怀旧甚至伤感”^⑯,并不自觉地将中美进行对比观照:“美国人认为很多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而中国人却对最细微的事情也充满感恩。”^⑰中国人质朴单纯,谦逊有礼,相比西方国家,中国的现代化

虽然起步稍晚,但拥有“如此勤劳智慧的人民是一大优势”^⑧。对鲍大可来说,“毛主义新人”是具有炽烈的爱国热忱、高度的政治意识、强烈的集体观念和高超的技术能力的人,他们是“实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乌托邦蓝图”^⑨的人。概而言之,饱满的工作热情、乐观的生活态度、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热情友好的精神风貌等是美国左翼视野中“毛主义新人”的特质,与英语世界对我国“红色经典”的接受形成互文、互动和互鉴。

在20世纪50—70年代,很多法国左翼人士和知识分子也对“毛主义”怀有别样的热衷,像萨特(Jean-Paul Sartre)、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等法国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都很推崇毛泽东思想。

20世纪50—60年代,《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论文艺》等传播到欧洲,法国左翼有了接受毛泽东思想的机会,特别是法国左翼理论家找到了反映毛泽东思想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成果,并将其作为理论创新的来源,以阿尔都塞等人为代表,创立了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文论,诞生了阿尔都塞学派,促发了以青年知识分子为参与主体的法国“五月风暴”运动,涌现出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等激进的左翼理论家。一些左翼人士和知识分子还到中国来实地考察。如萨特和波伏娃于1955年9月来中国参观访问,逗留了45天,亲身感受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成就,研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回国后,萨特在我国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对新中国的观感》(1955年11月2日第3版),在法国的《法兰西观察家》(France-Observateur)周刊上发表了《我所见到的中国》(“La Chine que j'ai vue”, 1^{er} et 8 décembre, 1955),波伏娃则出版了《长征:中国纪行》(La longue marche: Essai sur la Chine, 1957),将他们所看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真实地传达给西方民众,向西方读者呈现出一个崭新的、日新月异的中国,对于消除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被称为法国“原样派”的菲利普·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茱莉亚·克里斯蒂娃、马尔斯拉·普莱奈(Marcelin Pleynet)、罗兰·巴尔特和弗朗索瓦·瓦尔(François Wahl)一行5人于1974年春天访问中国。他们先后游历了北京、上海、南京、洛阳、西安,参观了工厂、医院、学校、印刷厂,感受中国在经济建设和思想意识方面的巨大进步。回国后,他们著书立说,表达对此时中国社会现实的多重解读,认为中国为他们反思欧洲提供了参照,让他们经由中国更好地审视欧洲。^⑩正如刘宇宁所言:“原样派相信中国之于当代西方社会,就如同古希腊之于文艺复兴,他们期待着从这片神秘未知的土地上汲取灵感,以东方文明的智慧来颠覆和更新西方现有的知识和思想体系。”^⑪法国左翼人士和知识分子对中国的热衷为我国“红色经典”在法国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语境,而“红色经典”在法国的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他们对“毛主义中国”的津津乐道。比如20世纪60—70年代法国的先锋杂志《原样》先后登载了翻译成法语的10多首毛泽东诗词,有《登庐山》《到韶山》《答友人》《答李淑一》《为女民兵题照》《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等,而该杂志的合作者有德里达、福柯、巴尔特、克里斯蒂娃、热奈特等人。毛泽东的诗词,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关于人民文艺、群众路线、文艺与政治的理论主张,“毛主义新人”……在他们那儿是有机整一的。他们对“毛主义”的热衷和“红色经典”所反映的中国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是互为表里、互相彰显的。

三、“红色经典”的改编再造与新世纪国外的“中国模式”认知

改革开放之后,“红色经典”沉寂了一段时间。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出现了对毛泽东的怀旧情绪。90年代后期,“红色经典”作品开始被大量改编成电视剧,引发了国外学术界对我国“红色经典”的新一轮关注。新世纪以来,境外特别是英语世界出现了一批相关的研究论文和著作,如《后毛泽东时代的“红色经典”再造:作为大众文化的电视剧改编》^⑫《“红色经典”的原创及再造:政治、审美与大众文化》^⑬《红色遗产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文化后

世》⁵⁵《革命舞台的创造：中国革命历史剧及其在西方的影响》⁵⁶，而对《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更是情有独钟，出现了《重构红色经典：新世纪〈红色娘子军〉电视剧改编中的阶级话语》⁵⁷《〈红色娘子军〉中的审美、意识形态和记忆伦理》⁵⁸《女战士：〈红色娘子军〉中花木兰父权叙事的重现》⁵⁹《〈中国人在巴黎〉：〈红色娘子军〉及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毛主义》⁶⁰以及《塑造跨界英雄：〈智取威虎山〉电影和其文本系谱的跨界联结》⁶¹《文化革命中的革命历史剧和中国的现代化政治：〈智取威虎山〉解析》⁶²等等。这些研究形成了“红色经典”在西方世界的知识再生产，而且并不局限于对“红色经典”原始文本的阐释，更多的是交织着历史、时政、文化与个人理念的知识新造，彰显着我国“红色经典”的生命力。

关于“红色经典”的电视剧改编，澳大利亚科廷大学的学者宫倩(Qian Gong)认为，受政治和商业化因素影响，“红色经典”的再造体现出一些新特点：既要符合官方要求，也要满足大众需求，同时还要体现先锋艺术理念。因而，红色文化遗产在电视剧改编过程中表现出杂糅的特征。⁶³并以《林海雪原》为主要案例，剖析“红色经典”的电视剧改编对原先黑白分明的人物模式的突破：英雄不再因其无产阶级出身就不可战胜、完美无缺，而是由于其智慧、不屈不挠的精神和个人魅力赢得尊重；英雄不再是圣人，而是有着缺点和不足的凡俗人。另外，敌对形象也被赋予人性色彩。⁶⁴同时，宫倩还以《红色娘子军》《沙家浜》等为例，探究“红色经典”及其电视剧改编中对女性特质的不同定位，指出毛泽东时代对革命女性和女性特质的界定已经被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所改写，强调“红色经典”电视剧生产和消费中电视网络、制作团队、电视受众、新闻媒体和相关利益方复杂的动态关系催生出女性革命英雄去政治化的主体性：她们是具有独立意志、职业能力、绽放女性魅力而又没有逾越道德规范的典型。⁶⁵此外，宫倩还以革命老区临沂为个案，阐明“红色经典”的消费如何与当地的认同关联起来，分析地域性在“红色经典”生产和消费中所扮演的角色，揭示革命文化作为重要资源对地方发展的推动作用。⁶⁶总之，“红色经

典”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电视剧改编揭示了国家权力、大众消费、文化生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学者罗斯玛丽·罗伯茨(Rosemary Roberts)关注改革开放时代“红色经典”的连环画改编，从主题与风格方面将毛泽东时代的“红色经典”连环画和改革开放时代的“红色经典”连环画进行对比分析，认为前一时期的连环画相对简单粗糙，主要面向孩子和文化水平不高的读者，而后一时期制作的连环画则更加精良细致，面向有艺术鉴赏力的中层读者群。⁶⁷不仅如此，“文学形象经由插图、连环画等静态图像转化”“得到不同形式的重塑”⁶⁸，“人物形象被赞赏甚至成为效仿的榜样”⁶⁹。国外学者也注意到改革开放时代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回归对“红色经典”再造的作用。比如宫倩剖析1961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红嫂》如何在2011年改编成电视剧，强调儒家思想在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⁷⁰；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拉腊·范德斯戴伊(Lara Vanderstaay)认为《新地道战》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中国传统家庭观念的回归，面对中国的老龄化现象，呼吁年轻人要更加奉行孝道⁷¹。

“红色经典”经历了时光的浸润，形成红色歌曲、红色艺术、红色收藏、红色旅游等文化遗产。那么，经过40多年的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发展，毛泽东时代的理念、现象和记忆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当今中国的思想与文化？革命、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概念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又有哪些美学形式、行为模式、思维方式被继承下来？也就是说，现在如何记忆并召唤过去？过去又怎样影响并改变现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陈小眉(Xiaomei Chen)教授在《演绎“红色经典”：从〈东方红〉到〈复兴之路〉》中探讨了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初的三部大型革命音乐舞蹈史诗，即1964年的《东方红》、1984年的《中国革命之歌》和2009年的《复兴之路》，认为40多年之后政治的美学化依然在延续，革命史诗以其持久不衰的力量影响着“历史叙事、政治走向、流行与明星文化和国族情感”⁷²。澳大利亚汉学家白杰明(Geremie R. Barme)认为，毛泽东时代的“思想、语言、实践”构成中国的红色遗产，在今天依然“闪烁着其光华、发挥

着其效用”。^②“红色经典”不是躺在博物馆和图书馆里睡大觉,它们在当今中国的政治生态中依然鲜活地存在着。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和精神资源,“红色经典”在文化、文学、艺术、政治、思想甚至经济等领域,仍然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方方面面。

与国外文学、文化、思想领域对“红色经典”的关注相一致的是国外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对我国改革开放后中国发展模式的热议,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外有关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模式的著作和论文不断涌现。如《中国发展模式:国家与市场之间》^③《中国模式:贤能政治与民主的局限》^④《中国商业模式:创新性与局限性》^⑤《全球治理再思考:中国模式正在形成?》^⑥《中国模式:激励性的社会主义》^⑦《中国模式和全球危机: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到中国治理范式》^⑧《中国模式及其在比较语境下的效能》^⑨《中国模式的动态性:经济与政治的共同发展》^⑩《津巴布韦的中国模式:“一带一路”倡议及其超越》^⑪《坦桑尼亚的发展轨迹证明借用“中国模式”了吗?》^⑫《另一种中国模式:道家思想、多元化和政治自由主义》^⑬等,从多个维度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模式进行特点归纳、成就评析、原因追溯,探讨中国模式的借鉴价值及其不可复制性,使得当代中国研究在国外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国外的研究者认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不是彼此分隔,而是紧密关联的,改革开放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的历史遗产。“红色经典”作为毛泽东时代的重要遗产,其所反映和书写的中国发展道路是新世纪以来国外热衷探讨的中国模式的根基和底色。改革开放时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国外对我国“红色经典”的研究与阐释,同近年来国外学界热衷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渴望解密当代中国成功发展经验的内在需求,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呼应。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认为,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存在着承继关系”^⑭,英国经济学者罗思义(John Ross)在其中文著作《别误读中国经济》新书发布会上说:“尽管中国在1978年之后有市场的改革,但有一个基本的持续性,改革开放前的1949—1978

年,及1978年之后一直到现在,这两个时期并非是割裂的,实际本质上是联系在一起的,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一直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⑮中国前30年的发展为改革开放时期更好地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⑯。而中国从改革开放中摸索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可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甚至认为:“这种模式吸引追随者的速度几乎与美国模式使他们敬而远之的速度一样迅速。”^⑰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更是进一步指出:“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⑱而“由于借鉴了中国许多成功的经验,越南的革新开放少走了许多弯路”^⑲;俄罗斯政要也不讳言“中国经验”的借鉴价值,声称在建设俄联邦经济特区时“主要借鉴中国经验”^⑳。

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和话语体系,“红色经典”在国外的知识重构和留下的红色文化遗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社会对当代中国的认知。国外对我国“红色经典”的关注将文学、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不同领域的文本“关联”起来,它们之间指向某种协作或互证的关系。从本土来说,这种协作或互证的关系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变革与文学创作的互动;从“红色经典”作品和红色文化的海外传播来说,这种协作或互证的关系使国际社会对当代中国的认知进一步深化、系统化和全面化。“红色经典”成为国外动态地观察、理解中国的一扇窗口。

结语

“红色经典”由于从根源上言说着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成为国际社会认知“中国模式”、观照“中国道路”的重要维度。“红色经典”为“中国道路”提供了内生性力量,其所奠定的红色文化和蕴含的红色基因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而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中国范式”,代表着人类文明的一种新形态,是国际社会认知中国的新维度,也是中国与世界对话的新议题。“红色经典”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寓言,成为跨民族、跨国界、跨文明交流互鉴的

重要思想资源。

“红色经典”在国外的传播还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让我们来解读世界和反观自身,体现出“从中国看世界”“从世界看中国”的回旋交错。国外对“红色经典”的接受和阐释内蕴着他们对自我的言说,这种自我言说有他们自身欲望的投射在里面。我们从这种投射了其自身欲望的言说中可以反观域外的思想意识,这是一种回返的“从中国看世界”。同样,“红色经典”在国外的传播也可以让我们反观自身,以“从世界看中国”的视角思考如何利用“红色经典”来深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正向认知。“红色经典”借助翻译和海外传播拓展了其艺术潜能,并通过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关联,建构起一个国外认知中国的宏观语境和框架,在当下对于国外认知中国依然有其难以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注释:

①这些作品也有先在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上节选发表,后结集出版的。可以说,外文出版社和《中国文学》杂志二位一体,合力推动了“红色经典”的海外传播。

②比如,用“谷歌学术”(Google Scholar)搜索在英语国家出版的四部我国“红色经典”戏剧集的引用次数,截至2023年7月12日,分别是:《舞台上的中国:一位美国女演员在中国》50次,《共产主义中国戏剧集》30次,《五部中国共产主义戏剧》30次,《红梨园:革命戏剧三种》16次。用“谷歌学术”搜索我国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译成英语的“红色经典”作品,同样截至2023年7月12日,引用次数显示:《青春之歌》为24次,《红色娘子军》9次,《林海雪原》9次,《白毛女》8次,《红日》4次,《山乡巨变》3次,《红灯记》3次,《创业史》2次;《保卫延安》《红旗谱》《智取威虎山》《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海港》尚未查到引用。

③参见倪秀华、焦琳:《国家翻译实践视域下的“十七年”红色经典小语种翻译》,《外语研究》2023年第1期,第59页。

④参见何明星:《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影响效果评估研究——以〈白毛女〉等十部作品为例》,北京:新华出版社,2018年;何明星:《传播学视野下的中国当代文学70年世界影响》,《文艺报》2019年8月9日,第2版。

⑤《中芭演经典剧目〈红色娘子军〉征服巴黎观众》,《黄河之声》2009年第1期,第75页。

⑥杨枫:《知识翻译学宣言》,《当代外语研究》2021年第5期,第2页。

⑦Arnold H. Rowbotham, "Book Review: *Great Changes in a Mountain Village I*, by Chou Li-Po; Derek Bryan", *Books Abroad*, No. 3, 1962, p. 335.

⑧T. A. Hsia, "Heroes and Hero-Worship in Chinese Communist Fic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 1963, pp. 113-138.

⑨T. A. Hsia, "Heroes and Hero-Worship in Chinese Communist Fic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 1963, p. 120.

⑩T. A. Hsia, "Heroes and Hero-Worship in Chinese Communist Fic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 1963, pp. 122-126.

⑪T. A. Hsia, "Heroes and Hero-Worship in Chinese Communist Fic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 1963, p. 130.

⑫T. A. Hsia, "Heroes and Hero-Worship in Chinese Communist Fic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 1963, p. 132.

⑬T. A. Hsia, "Heroes and Hero-Worship in Chinese Communist Fic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 1963, p. 123.

⑭Joe C. Huang, *Heroes and Villains in Communist China: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Novel as a Reflection of Life*, London: C. Hurst, 1973.

⑮Perry Link, "Book Review: *Heroes and Villains in Communist China: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Novel as a Reflection of Life*, by Joe C. Huang",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59, 1974, pp. 612-614.

⑯D. W. Fokkema, "Book Review: *Heroes and Villains in Communist China: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Novel as a Reflection of Life* by Joe C. Huang", *T' Oung Pao*, Vol. 62, 1976, p. 129.

⑰Roy E. Teele, "Book Review: *Modern Drama from Communist China* by Walter J. Meserve; Ruth I. Meserve", *Books Abroad*, No. 4, 1971, p. 735.

⑱Constantine Tung, "Books Review: *Modern Drama from Communist China* by Walter J. Meserve and Ruth I. Meserv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No. 3, 1971, p. 676.

⑲G. L. Anderson, "Book Review: *China on Stage: An American Actres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by Lois Wheeler Snow", *Comparative Drama*, No. 3, 1973, p. 255.

⑳倪秀华、焦琳:《国家翻译实践视域下的“十七年”红色经典小语种翻译》,《外语研究》2023年第1期,第60页。

㉑鹿地亘:《〈暴风骤雨〉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寒而栗的真相》,武鹰、宋绍香:《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第四辑现代文学专辑》,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95-196页。

㉒刘宏:《写在“民族寓言”以外:中国与印尼左翼文学运动》,《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2期,第51页。

⑳西方知识界所说的“毛主义”(Maoism)主要指毛泽东思想。

㉑ Robert A. Scalapino, "Communism in Asia: Towar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in Robert Scalapino ed.,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Asia: Tactics, Goals, and Achievement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69, p. 25.

㉒ Robert A. Scalapino, "Communism in Asia: Towar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in Robert Scalapino ed.,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Asia: Tactics, Goals, and Achievement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69, p. 31.

㉓ Robert A. Scalapino, "Communism in Asia: Towar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in Robert Scalapino ed.,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Asia: Tactics, Goals, and Achievement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69, p. 32.

㉔ Dolly Veale, "Mao More Than Ever!" in Fred Ho et al. eds., *Legacy to Liberation: Politics and Culture of Revolutionary Asian Pacific America*, Brentwood TN & San Francisco CA: Big Red Media and AK Press, 2000, p. 184.

㉕ Felix Greene, *The Wall Has Two Sides: A Portrait of China Today*, London: Jonathan Cape, 1963, p. 39.

㉖ W. E. B DuBois, "I Sing to China", *China Reconstructs*, Vol. 7, 1959, p.26.

㉗ Lois Wheeler Snow ed., *China on Stage: An American Actres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2, p. 245.

㉘转引自刘堃:《红色文学经典〈青春之歌〉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文艺论坛》2022年第1期,第83页。

㉙ Felix Greene, *Awakened China: The Country Americans Don't Know*,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1, p. 126.

㉚ Felix Greene, *Awakened China: The Country Americans Don't Know*,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1, p. 84.

㉛ Edgar Snow,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Red China Today*, New York: Random House,(1st edition 1962), 1966, p. 58.

㉜ John Kenneth Galbraith, *A China Passag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73, p. 43.

㉝ Harrison E. Salisbury, *To Peking—and Beyond: A Report on the New Asia*, London: Arrow Books Ltd. 1973, p. 99.

㉞ Felix Greene, *Awakened China: The Country Americans Don't Know*,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1, p. 50.

㉟ Felix Greene, *Awakened China: The Country Americans Don't Know*,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1, p. 299.

㊱ Edgar Snow,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Red China Toda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st edition 1962), 1966, p. 197.

㊲ Felix Greene, *Awakened China: The Country Americans Don't Know*,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1, p. 101.

㊳ Felix Greene, *Awakened China: The Country Americans Don't Know*,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1, p. 47.

㊴ Edgar Snow,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Red China Today*, New York: Random House(1st edition 1962), 1966, p. 166.

㊵ John Kenneth Galbraith, *A China Passag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73, p. 119.

㊶ John Kenneth Galbraith, *A China Passag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73, p. 120.

㊷ Tillman Durdin et al., *Report from Red China*,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71, p. 234.

㊸ Tillman Durdin et al., *Report from Red China*,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71, p. 246.

㊹ Tillman Durdin et al., *Report from Red China*,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71, p. 247.

㊺ Tillman Durdin et al., *Report from Red China*,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71, p. 248.

㊻ Arthur Dock Barnett, *Communist China in Perspective*,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2, p. 38.

㊼[法]弗朗索瓦·于连等:《(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远西对话》,张放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

㊽刘宇宁:《符号的神话——法国“原样派”的“毛主义”时期》,《前沿》2015年第2期,第144页。

㊾ Qian Gong, *Remaking Red Classics in Post-Mao China: TV Drama as Popular Media*,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21.

㊿ Rosemary Robert and Li Li, eds., *The Making and Remaking of China's "Red Classics": Politics, Aesthetics and Mass Cultur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① Jie Li and Enhua Zhang, eds., *Red Legacies in China: Cultural Afterlives of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② Xiaomei Chen, "The Making of a Revolutionary Stage: Chinese Model Theatre and Its Western Influences," in Claire Sponsler and Xiaomei Chen, eds., *East of West: Cross-Cultural Performance and the Staging of Difference*, New York: Palgrave, 2000, pp. 125-140.

⑤⑥ Rosemary Roberts, "Reconfigure Red: Class Discourse in the New Millennium TV Adaptation of *The Red Detachment of Women*", *China Perspectives*, No. 2, 2015, pp. 25-31.

⑤⑦ Eric Mullis, "Aesthetics, Ideology, and Ethics of Remembrance in *Red Detachment of Women*", *Dance Choice*, No. 1, 2017, pp. 53-73.

⑤⑧ Zhuying Li, "Female Warriors: A Reproduction of Patriarchal Narrative of Hua Mulan in *The Red Detachment of Women*(1972)", *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No. 1, 2020, pp. 1-12.

⑤⑨ Nan Ma, "*Les Chinois à Paris: The Red Detachment of Women* and French Maoism in the Mid-1970s", *China Perspectives*, No. 1, 2015, pp. 43-51.

⑥⑩ Zhuoyi Wang, "Transforming the Liminal Hero: Border-Crossing Interconnections in *The Taking of Tiger Mountain* and Its Textual Pedigree", *Chinese Literature Today*, No. 1, 2018, pp. 118-128.

⑥⑪ Barbara Mittler, "Cultural Revolution Model Works and the Politics of Modernization in China: An Analysis of *Taking Tiger Mountain by Strategy*", *The World of Music*, No. 2, 2003, pp. 53-81.

⑥⑫ See Qian Gong, "Hybridizing the Red Classics in Post-Mao China: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Context", in Qian Gong, *Remaking Red Classics in Post-Mao China: TV Drama as Popular Media*,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21, pp. 21-39.

⑥⑬ See Qian Gong, "From Chief to Chef: Remolding the Heroes", in Qian Gong, *Remaking Red Classics in Post-Mao China: TV Drama as Popular Media*,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21, pp. 41-55.

⑥⑭ See Qian Gong, "Getting the Right Mix Revolutionary Women and Contemporary Femininity", in Qian Gong, *Remaking Red Classics in Post-Mao China: TV Drama as Popular Media*,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21, pp. 57-76.

⑥⑮ See Qian Gong, "Living Red Production, Consumption, and Local Memory of Revolutionary Culture in Linyi", in Qian Gong, *Remaking Red Classics in Post-Mao China: TV Drama as Popular Media*,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21, pp. 77-96.

⑥⑯ See Rosemary Roberts, "The Politics and Aesthetics of Rediscovering Heroes of the 'Red Classics' in Lianhuanhua of the Reform Era", in Rosemary Roberts and Li Li, eds., *The Making and Remaking of China's "Red Classics": Politics, Aesthetics and Mass Cultur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115-135.

⑥⑰ 李染澄、凌晨光:《媒介转化中的文学形象流变——以〈红旗谱〉中的春兰为例》,《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第132页。

⑥⑱ See Rosemary Roberts, "The Politics and Aesthetics of Rediscovering Heroes of the 'Red Classics' in Lianhuanhua of the Reform Era", in Rosemary Roberts and Li Li, eds., *The Making and Remaking of China's "Red Classics": Politics, Aesthetics and Mass Cultur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132.

⑥⑲ See Qian Gong, "*The Red Sister-in-Law* Remakes: Redefining the 'Fish-and-Water' Relationship for the Era of Reform and Opening", in Rosemary Roberts and Li Li, eds., *The Making and Remaking of China's "Red Classics": Politics, Aesthetics and Mass Cultur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156-176.

⑥⑳ See Lara Vanderstaay, "Families, Intellectuals, and Enemies in the 'Red Classic' Remake *New Tunnel Warfare*", in Rosemary Roberts and Li Li, eds., *The Making and Remaking of China's "Red Classics": Politics, Aesthetics and Mass Cultur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177-187.

⑥㉑ Xiaomei Chen, "Performing the 'Red Classics': From *The East Is Red* to *The Road to Revival*", in Jie Li and Enhua Zhang, eds., *Red Legacies in China: Cultural Afterlives of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153.

⑥㉒ Geremie R. Barmé, "Red Allure and the Crimson Blindfold", in Jie Li, and Enhua Zhang eds., *Red Legacies in China: Cultural Afterlives of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380.

⑥㉓ Dominique de Rambures, *The China Development Model: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Marke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⑥㉔ Daniel A. Bell, *The China Model: 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⑥㉕ Elisabeth Paulet and Chris Rowley, eds., *The China Business Model: Originality and Limits*, Cambridge, MA: Chandos Publishing, 2017.

⑥㉖ Lai-Ha Chan et al., "Rethinking Global Governance: A China Model in the Making?", *Contemporary Politics*, No. 1, 2008, pp. 3-19.

⑦ R. G. Lister, "The China Model: Incentive Socialism", *New Zealand Journal of Geography*, No. 1, 2008, pp. 13-16.

⑧ Shaun Breslin, "The 'China Model' and the Global Crisis: From Friedrich List to a Chinese Mode of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No. 6, 2011, pp. 1323-1343.

⑨ Liang Tang, "The China Model and Its Efficacy in a Comparative Context", *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 No. 1, 2016, pp. 174-187.

⑩ Ling Chen and Barry Naughton, "A Dynamic China Model: The Co-Evolution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No. 103, 2017, pp. 18-34.

⑪ Willie D. Ganda, "The China Model in Zimbabw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Beyond", *Politics & Policy*, No. 5, 2020, pp. 932-959.

⑫ Abel A. Kinyondo, "Does Tanzania's Development Trajectory Borrow from the China Model?", *Politics & Policy*, No. 5, 2020, pp. 960-987.

⑬ Devin K. Joshi, "The Other China Model: Daoism, Pluralism,

and Political Liberalism", *Polity*, No. 4, 2020, pp. 551-583.

⑭ Robert Lawrence Kuhn, *How China's Leaders Think: The Inside Story of China's Reform and What This Means for the Future*,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2010, p. 122.

⑮ [英]罗思义:《看懂中国,需先破除三大误读》,观察者网, https://www.sohu.com/a/306784564_115479, 2019年4月9日。

⑯ Martin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 London: Penguin Press, 2009, p. 99.

⑰ [美]乔舒亚·库珀·雷默:《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第7期,第8页。

⑱ 转引自张明仓:《以国际视野增强理论自信》,《学习时报》2017年11月27日,第2版。

⑲ 《海内外评说邓小平的影响:他的作用比尼克松还大》,《国际先驱导报》2007年2月12日,第8版。

⑳ 《俄党政官员热衷“中国道路”邓小平理论启发普京》,《国际先驱导报》2007年12月13日,第5版。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Red Classics" and the Interaction and Mutual Learning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Jiang Zhiqin

Abstract: The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Red Classics", a literary and artistic genre closely integrated with contemporary social development of China, is inherently rela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understanding of China. "Red Classics" led to a phenomenon of knowledge reproduction with its widespread dissemination in some countries in Europe, America and Asia in the 1950s to 1970s. The recognition and appreciation for "Red China" from foreign intellectuals, especially the left-wing intellectu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 counteracted the negative western mainstream media portrayal of China at the time. Their enthusiasm for Maoism and the achievements of China's revolution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reflected in the "Red Classics" led to interaction and mutual learning. Since the 21st century, the concerns of adaptation and re-making of "Red Classics" in foreign literary and cultural fields have echoed implicitly with the inherent need in recent years in the foreig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fields to understand and eagerly explore the successful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contemporary China.

Key words: Red Classic; Overseas disseminatio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understanding of China; Interaction and mutual learning